

张角：略论马列毛主义的哲学基础

引言

为防止皓首穷经，我们言简意赅地提出几条引论，主要用来描述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加入到马列主义理论总宝库的新贡献。

1. 首先这些新贡献不能简单地冠以“中国特色”，这些新贡献具有普世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理。
2. 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继十月革命以后又一个人类历史的里程碑，深远影响超过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经验教训也超过两者。
3. 毛主席本人革命实践的深度与广度也要超过马克思和列宁，包括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这两类实践构成了马列毛主义的沃土和养料。

根据上述引论，我们提出如下三个论据。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人类思维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实践与认识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核心问题。
2.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率先提出“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列宁第一次详细梳理了实践与认识这对基本矛盾，阐述了哲学的党性。列宁纠偏了各种模棱两可的范畴，例如经验、感觉，思想，物，要素等等。
3.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详细描述了实践与认识这对矛盾，阐述了他们之间如何对立转换，提出了这对矛盾的运动公式。尤其是论述实践与认识的对立转换上，毛主席比马克思和列宁更进了一步。
《实践论》里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一层意思马克思和列宁都阐述过；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的“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台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这一层意思则有无穷意味。中国古代哲学里有知行关系，共相与殊相，有与无，名与实，理与事，这些范畴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猜不到故事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实践与认识的脱节。

一. 革命的实践

这一节我们从论据1展开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提出了“实践”，而且最重要的是“革命的实践”，能够“改变世界”的那种实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主要是对11条的通俗阐释。这些成果传承到列宁这里，列宁所要解决的就不是唯物主义一般问题了，而是在于真正夯实“革命的实践”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每逢革命低潮的时候（资本主义顺风顺水的时候），“妖魔鬼怪”就要兴风作浪。神秘主义，怀疑论，末世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厌世哲学，伴随着对唯物主义的讨伐，一股脑沉渣泛起。

在恩格斯在世的年代，“文明”的欧洲流行泛灵论，那时的科学家纷纷研究起“笔仙”，“碟仙”，“降灵”。而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低潮，直接导致俄国泛左翼全面溃败。他们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部分，表示要对“信仰”表示敬畏，甚至提出不如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宗教来认识，俄国著名泛左翼分子卢那查尔斯基和巴扎罗夫提出了“造神说”。这些派别如果仅仅是研究哲学自娱自乐倒也无妨，问题在于他们的错误思想在侵蚀革命队伍。“造神说”的恶劣影响在于：革命被当成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行为，而革命的结果是无法确定。

于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横空出世。列宁在驳斥那种把“感觉或经验”当作世界基本要素的唯心主义时，他与恩格斯共用了一个经典例子：“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或谬论，Schrullen）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

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理解的，—这个重要的词在普列汉诺夫的译文里和维·切尔诺夫先生的译文里都漏掉了）‘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

这一论证脉络在《实践论》里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说明：“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实践论》给出了把“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更生动的阐释：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更重要的在于“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实践论》前半部分把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唯物主义传统讲的很透。毛主席把社会实践概括为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种概括打通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其后阐述的认识运动的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把欧洲几百年经院哲学，即从笛卡尔到康德到黑格尔基本驳倒。第二个飞跃（理想认识到革命实践）继承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以来的全部优秀成果，而且还有更深度的挖掘。因为马克思与列宁没有系统论述过“错误认识”的根源，而毛主席在《实践论》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他认为：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

这就彻底埋葬了神秘主义。人类对于自身历史演进的一切挫折都没有必要灰心丧气。所以人类历史的前进也可以当作一部纠正自身错误认识的历史，正确与错误本身就是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毛主席指出：“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这部分论述可以直接衔接《矛盾论》。“实践—认识—再实践”这组运动是矛盾的运动，这组运动是阐述“革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是辟除泛左翼各种“怪力乱神”的基本依据。

二. 哲学的党性

这一节我们从论据2展开讲。哲学的党性就是指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进行理论思维并为哪个阶级服务，就是哲学的阶级性。

《实践论》指出了没有什么行家里手，没有什么生而知之者。毛主席后来明确说过：“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人生而平等，不平等是后天造成的，不平而鸣，而奋斗而造反。反之如果人生而不平等，去相信什么天才和英雄，那么这一立场就站在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举一个例子。文革为什么废除了高考？工农兵子弟在分数成绩上普遍不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干部子弟，这是客观事实。工农兵子弟缺乏足够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应付考试这种训练实践，故而他们不能取得比较好的分数。反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干部子弟较多这方面的实践，可以获取较高的分数。从实践层面上讲，不同的人经过实践都可以掌握某种程度的技能，作为高考这种特殊的训练实践而言也是如此，无非是多花时间精力，掌握其中的技巧罢了。假如人类的社会生产是以高考为准绳的，比如考试成

绩越好庄稼收成就越好，或者考试成绩越好石油就能更多开采，那么人类就应该不吃不喝专心高考，很明显这是荒谬的。但是统治者就用这种荒谬的标准，轻而易举的建立了阶级鸿沟的合理性。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波澜壮阔前赴后继的，但是大多数是失败的。原因是很好解释的。军事本事也是一种实践，造反的农民本身缺乏这方面的实践，所以被镇压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当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形成了燎原大火，那么在那些队伍里的幸存者势必是身经百战，经过了实战的军事洗礼，他们能够推翻腐败的政府，在军事上消灭腐败的政府军，也是很合理的。没有谁天生会打仗，打仗往往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群众一次次被镇压，一旦经验获得了积累，在挫折中不断实践（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总有一天倒霉的是政府军。因为政府军的军事训练也是很有限的，这方面知识几乎是不增长的，而群众的知识却在飞快的增长，这会到达一个转折点：镇压开始吃力，剿匪的结果是越剿越多。另一方面，政府军方面的分化，有着实战经验的中下级军官投入到人民行列，他们带来不仅仅是武器，更是成熟系统的军事知识和经验，那么矛盾的对立双方就是转换了。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只要这个链条不断掉，也即革命老本还在，革命火种仍然储备，那么肯定会成功。保持这个链条不断，这本身也是实践的结果。反动的统治者永远不会给人民机会去实践，他们只希望愚弄人民，让人民傻头傻脑的当他们的人肉电池。对于人民而言，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尽可能地去实践，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一切都是可以掌握的。

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治国安邦也是一种实践，人类几千年的黑暗历史里，除了文革的一丝曙光，人民几乎没有机会去实践管理国家，也不懂政治，但是一旦他们自己解放自己，在实践中摸索着掌握这里的窍门，有些可能藏在《资治通鉴》里，有些则是当代生活的创造，有些可能是需要扬弃的反动派独有的肮脏技巧。但是，如果永远浑浑噩噩下去，怎么可能学得会呢？

反动派总是寄希望于人民革命的失败，他们以为那点子独门秘笈可以吃一辈子，甚至于世代代吃下去。这违背《实践论》的基本原理。抛开他们所特有的统治经验，这是几千年实践的结果，他们还能有啥？没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三. 对立与统一

毛主席说过：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那个公式，这段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所以群众路线、实践论、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规律。

展开来讲，唯物主义即是物质决定精神，而非精神决定物质，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具有决定意义。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公式，而非“认识-实践-再认识”唯物史观即是群众（奴隶）创造历史（时势），造就英雄，而非英雄创造历史。群众路线则要把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一以贯之：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因而以上几条本质上是同一个规律的不同表述。

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却有着相对稳定的秩序与结构。要改变这些秩序与结构，归根到底还是要从物质的那一面，从实践的那一面，从群众的那一面去寻找答案。也即要相信到物质里去找客观规律，理解这些规律并勇于去实践，在群众那里得到检验，从中获得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实践过程是个主观加之于客观的过程，然后一念一想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由于这一特殊性，常常发生主客观不符的现象，这是一切错误的来源。主观是个活泼的方面，然而客观却是表面上相对惰性的一个方面。实践的终极目的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并能动地改造客观实际。两个方面的一致性，推动着事物矛盾两级的对立运动，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

反之实践的终极目的若不是上述所言，那么人类历史只能是宗教书里的幻想史。要想加快事物发展的速度，只能是加快主客观的一致性。由此产生像“共振”那样的效果，也可称之为共鸣。以唯物主义的角度观之谓“顺利”，以唯物史观的角度观之谓“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也可称之为“同仇敌忾”。不要老是想着“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不可能的。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与战术上的速决战”。不能设想“主观加诸于客观”的“主客观相符”的进程是个客观居于静止的状态下完成，客观也是在运动，这就是“主客观相符”的障碍。毛主席说：“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地，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地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字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二月一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以上我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已经在《矛盾论》中详尽论述了这个根本规律。我们仅对这一规律的可视化图像略作补充：像波浪一般。毛主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很多年后他又教导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

结论

列宁在《论策略书》里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而“现实”用列宁的话来说则是：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我们之所以讨论马列毛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在于我们的时代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遭遇了曲折的时代。政治冷淡主义和失败主义弥漫的时代需要正确的方法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人类实践中有着丰富的无穷无尽的新环节，这些新环节既能涵盖一切旧理论，同时也孕育着伟大的新理论。人类的实践永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